

開闢國共合作之路

一、聯合蘇俄

多年來，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人及共產國際代表建立了聯繫和交往，蘇俄革命成功和國內群眾運動的發展，使孫中山深受鼓舞，也促使他從深深反省過去一再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後，看到了新的希望。

早在辛亥革命後不久，列寧曾在《涅瓦明星報》及《真理報》上，連續發表有關孫中山和中國辛亥革命的文章：一九一二年發表過《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和《新生的中國》兩文；一九一三年發表了《中華民國的巨大勝利》、《中國黨派的鬥爭》和《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諸文，讚揚和高度評價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運動，說孫中山的思想「是真正偉大人民的偉大思想」，他所領導的辛亥革命的勝利說明「四億落後的亞洲人已經從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運動和鬥爭了」。這些，曾對於中國民主革命起了有益的推動和鼓舞作用。

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蘇俄政府就宣告廢除沙皇與其他各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外國的一切特權，表示了對一切被壓迫民族的友好態度。一九一九

年七月二十五日和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又先後兩次發表對華宣言，一再重申沙俄、臨時政府對外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密約「立即作廢」，無代價地放棄沙俄奪取的在華權益，還提議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正式恢復兩國人民的友誼，互相提攜，「為自由而戰」。這一切舉措使孫中山進一步受到極大鼓舞，得到了熱烈歡迎。

如前所述，孫中山很早就嚮往十月革命，希望學習俄國的經驗。這時，又受到蘇俄連續發表對華宣言的鼓舞，迅速地把企望的目光轉向蘇俄，更日益密切地注視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發展及蘇維埃政權的各項政策，還準備派廖仲愷、朱執信、李章達去蘇俄學習，並曾特為他們請了俄語教師學習俄文。

孫中山的聯合蘇俄主張以及學習蘇俄的願望，通過此後的與蘇俄代表、記者和使節們的通信、會晤和懇談，就逐漸萌發了。

一九二〇年秋，經陳獨秀介紹，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共產國際遠東局派到中國來的第一個使者維金斯基（一八九三—一九五三年，中文名字吳庭康，有時使用「魏琴」的筆名），這是共產國際使者同孫中山的第一次會見。維金斯基後來回憶說：「孫中山在自己的書房裡接見了我們。孫中山沒有搞那套中國的習慣性禮節，他立即請我們在桌子後坐下，接著便開始詢問關於俄國和俄國革命的情況。」維金斯基對這些一一作了介紹。孫中山「對一個問題極感興趣，那就是：如何將剛剛從盤踞廣州的反動桂軍手裡解放出來的華南鬥爭與遙遠的俄國的鬥爭結合起來」？孫中山抱怨說：「廣東的地理位置無法使我們同俄國建立聯繫。」他要

求與蘇俄建立電臺聯繫，「一直詢問是否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滿洲裡建立一個你們可以與廣州聯繫的大功率電臺」，從而使蘇俄能夠同廣州通訊。孫中山還說，他希望通過中國南部軍事勝利，在中部、北部各省發展革命運動。

在孫中山被非常國會推舉為非常大總統後，一九二一年四月的中、下旬，他在廣州接見遠東共和國通訊社（簡稱「遠東社」）駐廣州記者斯達揚諾維奇和俄羅斯通訊社、遠東社北京分社社長霍多羅夫·A，表述了對蘇維埃俄國的所有問題的關注。這是孫中山唯一的一次同蘇俄記者的談話。

斯達揚諾維奇和霍多羅夫·A在事後寫的一篇《和孫中山的一次談話》中這樣記載：「孫中山博士體格健壯，身材勻稱……他舉止文雅，鎮定自若，使人覺得他是一位堅強的人，是一位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很自信的人。孫中山個子不高，容貌整潔，圓臉龐，身穿著一件很普通的灰色短上衣。」孫中山在回答他們的問題時說：「中國人民對連綿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並深惡痛絕。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將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因而，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巨的歷史使命。」並指出：「中國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別人瓜分自己的國家，他們希望統一，成為一個強大的和不可動搖的民族。」孫中山在談到蘇俄問題時，明確說：「我對俄國和遠東發生的事情很感興趣。請問，蘇維埃俄國與遠東共和國不同之處何在？遠東共和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採訪者寫道：「俄國各階層人民在『不許干涉』的口號下團結一致，給孫中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孫中山對有關遠

東共和國的所有問題都極為關注。」

孫中山在加緊進行北伐準備工作的同時，也加強了同蘇俄的聯繫，並注意研究十月革命後蘇俄成功的經驗。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他在答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件中，介紹了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治情況和自己的艱難遭遇，切盼加強接觸，同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取得聯繫，以便瞭解它在政治、軍事、教育等方面的經驗。他懇切地說：「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軍隊和教育的組織。」在信中他向「列寧以及所有為了人類自由事業而有許多成就的友人們致敬」，還提出今後通信聯繫的意見。這封信，表達了孫中山要同蘇俄建立聯繫的願望。

同年六月三日，列寧指派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上海，會見了張繼，同國民黨總部建立了聯繫。之後，他在年底由張太雷陪同到廣西桂林會見了孫中山。

孫中山和馬林進行了三次長談，談了有關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情況，雙方討論了中俄聯盟的可能性。據馬林回憶說：「我與孫討論了群眾運動和在工人階級中進行宣傳的必要性等等。我告訴他爪哇民族主義性質的群眾組織——伊斯蘭教聯盟的發展；孫則向我講述了國民黨的策略、它的歷史、袁世凱時期在國外的非法活動、與太平洋各國華僑的聯繫和他們對國民黨的幫助。」孫中山對蘇俄實行新經濟政策特別感到興趣，並把這種政策同他的民主主義政策誤解為一體。

事後，孫中山在給廖仲愷和汪精衛的電報中談到這一問題時說：「蘇俄革命後實行馬克思之共產主義，余甚滋疑。以現世界正在資本主義旺盛時代，俄國工商業不甚發達，共產主義不能單獨成功，其去實行之期尚遠。今聞馬林言，始悉蘇俄行共產主義後，以深感困難，乃改行新經濟政策。此種新經濟政策，其精神與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不謀而合。余深信蘇俄能先實行與余之主義相符之政策，益信余之主義切合實行，終必能成功也。」儘管這是一種誤解，但正是從這個基本點出發，孫中山萌發了聯合蘇維埃俄國的念頭。

當時，馬林研究了中國政局，認為香港英國政府一定不允許廣州革命政府發展，陳炯明與孫中山也不能相容。他還向孫中山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點建議：「第一，要進行中國革命，就要有好的政黨，這個政黨要聯合各界人民，特別是工農大眾。第二，要有革命的武裝核心，要辦軍官學校。」這幾句話正說到孫中山的心坎裡。經過多少次



一九二二年八月，孫中山委託廖仲愷到日本與蘇俄代表越飛會談合作問題。圖為同年冬廖仲愷等人在日本時的合影。

革命的失敗，孫中山的確也感到這兩個問題的重要。他所領導的革命黨，經過幾次改組，名稱換了好幾個，最後叫做中國國民黨。但是這個政黨的力量很薄弱，起的作用不大。他曾經聯絡過南方地方軍閥的軍隊，但是一再被利用和被驅逐。因此，孫中山十分贊同這兩點建議，深感這次會見使他「心上非常高興」。

一九二二年三月，少共國際代表 C·A·達林到達上海，隨即被任命為蘇俄政府全權代表同孫中山談判。四月二十七日，他在瞿秋白、張太雷的陪同下，由上海到廣州會見了孫中山。據達林記述：從四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六日，孫中山同達林每週至少會談兩次，每次會談都有兩小時左右。孫中山向達林介紹了華南情形，並瞭解了蘇俄的情況，對紅軍的規模、組織和政治教育很感興趣。孫中山充分表達了自己「對蘇俄的友好感情」，並「說明他打算與蘇俄建立聯繫」。

通過上述這些活動，孫中山對蘇俄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從而考慮以俄國為榜樣來促進中國革命的發展，並希望在今後的革命事業中能夠得到蘇俄的幫助，從此，他決意要走聯俄師俄的道路。

二、容納中共

一九二二年，由於陳炯明的叛亂，使心情十分沉重的孫中山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尋找新的同盟者。當孫中山在這一年的八月十四日再次回到上海時，中國共產黨已於六月十五日發

表了《第一次對於時局主張》，又於七月在上海舉行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對於時局主張》向人民指出，中國禍亂的根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口號。它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作了公正的評價，同時也坦率地批評了國民黨的錯誤，指出：「中國現存的各政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正的民主派」，但是「他們黨內往往有不一致的行動及對外有親近一派帝國主義的傾向，對內兩次與北洋軍閥攜手……這種動搖不定的政策，實有改變的必要」。並表明中國共產黨願與孫中山聯合。還提出了和國民黨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作堅決鬥爭的具體主張。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發表的宣言中，對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狀況和當前的革命任務等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規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指出中國人民革命的當前的基本任務是：「（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為真正民主共和國。」代表大會還明確提出同國民黨及其他社會組織建立聯合戰線的主張，並作出了《關於「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指出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必須暫時聯合民主派才能夠打倒公共的敵人——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

這些文件中，提出的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及對國民黨的批評和建議，對於正處在苦悶彷徨中的孫中山是有力的幫助，使他對時局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回顧自己多年來和封建軍閥

鬥爭的親身經歷，開始認識到南北軍閥的背後，有帝國主義在那裡操縱，逐漸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口號提得正確。

早在一九二二年初，馬林經過調查認為孫中山的國民黨是一個在中國可以聯合的革命黨後，便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同國民黨聯合的建議，並主張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同國民黨建立黨內聯合的統一戰線。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同年八月下旬中國共產黨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即西湖會議），作出了部分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同月二十五日，馬林在上海法租界孫中山住所再次會見了孫中山，向孫中山介紹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決定，積極促成國共合作。他還勸告孫中山不要單靠軍事行動去收復廣州，而要以上海為基地開展群眾性的宣傳活動。與此同時，陳獨秀和李大釗等分別拜會孫中山，對他表示慰問和支持；還同張繼就兩黨合作問題交換了意見，直接給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以積極影響和幫助。

當時，中共早期領導者李大釗為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參加西湖會議之後，於八月底到上海莫里哀路孫中山寓所和孫中山進行多次交談，討論了「振興國民黨以便進而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有一次，他們專門就振興中國問題暢談了好幾個小時。孫中山對這種真誠的幫助感到非常興奮，和李大釗「暢談不厭，幾乎忘食」。並當即提議李大釗加入國民黨。當李大釗表示自己是第三國際的一個黨員時，孫中山回答說：「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的黨員，儘管加入本黨幫助我。」明確地表達了黨內合作的願望。此

為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員之始。

孫中山對李大釗十分尊敬，「他認為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鬥爭中他能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李大釗也常到孫中山家裡去做客，就革命工作交換意見。李大釗根據中共的提示，同意了孫中山的提議，他由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最先加入國民黨。這也為此後的中共黨人加入國民黨開了先河。接著，有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張國燾等一批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陸續加入國民黨。孫中山進一步得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

為了促進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實現，中國共產黨還通過同年九月創刊的機關報《嚮導》週報發表文章，對孫中山提出善意的批評和忠告。

例如蔡和森的文章就指出：如果一味依靠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進行縱橫捭闔，用這個辦法來抵抗暴力，將會失掉革命的生命。要使革命成功，便要一面「與民眾為親切的結合」，一面與列寧的蘇維埃俄國攜手，「大著膽子明白地反抗……兩種惡勢力（按：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又如，在《國民運動、革命軍和革命宣傳》一文中，指出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孫中山在上海。

孫中山「只是時常依靠別的有力分子對他的感情為轉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還是他的好朋友，今天能夠翻臉，明天或成仇敵」。對他幻想利用軍閥力量，企圖從聯絡一派打倒一派中取得勝利的嚴重錯誤，提出了善意的批評。要他依靠民眾，組織真正革命的軍隊。再如，在《羞見國民的中國國民黨》一文中，針對國民黨歷來偏重於軍事活動，忽視對群眾的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的缺點，指出：這是國民黨自辛亥革命以來十二年奮鬥一無所成的最主要原因。李大釗還在《普遍全國的國民黨》一文中，呼籲：「中國現在很需要一個普遍全國的國民黨，國民黨應該有適應這種需要努力於普遍全國的組織和宣傳的覺悟。」

同年八月，蘇俄政府為與北京政府商談外交、商務關係，特命副外長越飛以全權大使身分來華。越飛在北京一面進行緊張的外交活動，一面於同月下旬派代表攜函到上海與孫中山接洽。孫中山與越飛的代表進行了會晤，回答了所問的「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方法」，並請其先派與越飛同行的軍事工作者到上海來，以便詳細瞭解軍事問題。這一會晤更加強了孫中山前進的決心，他滿懷喜悅地認為：「從此彼此（已）通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又在致蔣介石函中說：「兄前有志於西圖。吾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吾幸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相接近。」

接著，孫中山同越飛直接通訊聯繫，商討有關革命的各種迫切問題。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月間，他們曾往來信件七次（越飛寫信四封，孫中山覆信三封）。在通信中，越飛向孫中山介紹了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內與國際的狀況，介紹了他與北京當局就同中國建交問題而進行的談判和他所遇到的困難。孫中山也向越飛介紹了中國內部的政治形勢，講述了自己的政治、

軍事計畫，尖銳地批評了北京政府，說它是「某個外國的代理人」。孫中山寫道：「這個評語用在同蘇俄的談判上和關係上是特別正確的。十分清楚，有些國家不願中國和俄國達成協議，除非它們先從莫斯科得到經濟投降的條件。與此同時，它們也不歡迎我們兩國有達成能促進中國擺脫它們的政治和經濟壓制的任何協定的前途。」通過信函的不斷來往，孫中山與越飛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同年十二月，孫中山又派張繼去北京會見越飛，商談他要與越飛親自會晤的問題。

當時蓬勃發展的工農群眾運動，對於孫中山的思想的轉變，也起了促進作用。

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在各地先後建立起領導工人鬥爭的各種組織；很快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的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在一年多的時間內，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有三十多萬工人進行了多次的罷工。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六萬多海員為反抗英國資本家的壓迫，要求增加工資，舉行了堅持八個星期之久的大罷工。支持這一鬥爭的，遍及香港全市的所有工人，參加鬥爭的達十多萬人。在毛澤東領導下，湖南地區到一九二二年秋，就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會員有四萬餘人，先後舉行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工人、粵漢鐵路工人、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鋅礦工人等十多次罷工鬥爭。在鬥爭勝利後，於十一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一九二三年初爆發了震動中外的京漢鐵路工人「二七」大罷工。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運動也發展起來了。一九二三年，在毛澤東領導下，湖

南衡山縣成立了岳北農工會。同年一月，廣東海豐縣成立起總農會，會員達十萬人，對地主階級進行了減租鬥爭。接著廣東各地農民也組織起來，不少縣成立了農會，會員增加到二十多萬人，形成了一支強大的農民革命隊伍。還有很多地區的農民反抗統治階級的自發鬥爭，也風起雲湧，綿延不絕。

孫中山從這些工人、農民群眾運動中，特別是從香港海員大罷工和「二七」罷工的偉大鬥爭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啟發。他逐步覺察到工農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革命力量，從而促使他在思想上和革命實踐上的重大轉變，在迂回曲折的革命進程中走出了死胡同，找到了正確的出路。從此，孫中山邁上了聯俄容共的嶄新大道。

孫中山虛心接受中國共產黨和蘇俄代表所提出的建議，決心採取聯合共產黨的政策，對國民黨進行改組，使它成為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三、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

廣州革命政權重新建立和廣東革命根据地基本穩固之後，孫中山在整軍北伐的同時，積極進行改組中國國民黨的準備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真誠幫助下，孫中山很快完成了中國國民黨改組的一切準備。

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以來，內憂外患，國無寧日。客觀形勢的發展對資產階級革命黨的要求越來越高，然而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狀況遠遠不能適應革命發展的要求，除少數

黨員尚能以三民主義為行動指南，跟隨孫中山奔走革命，屢仆屢起外，大多數黨員放任自由，沒有指導。由於缺乏堅強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雖有數十萬黨員，但不能收到統一行動的效果。孫中山認為只有重新組黨才是補救之策。他為著改善國民黨存在的「組織未備、訓練未周」、「分子此刻過於複雜、黨內的人格太不齊」的現狀²⁹，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從一九二二年九月開始進行改組國民黨的準備工作，為實現國共合作創造條件。

九月四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了研究改進黨計畫的首次會議，與會者有張繼等五十三人。孫中山即席解釋了聯俄容共政策。馬林應邀參加並講了話。會議一致贊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主張，並初步成立了改組工作的機構。九月六日，孫中山指定茅祖權、覃振、丁惟汾、張秋白、呂志伊、田桐、陳獨秀、陳樹人和管鵬九人為中國國民黨改進黨起草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黨務改進黨起草委員。³⁰不久，起草委員會起草的改進黨初稿完成。十一月十五日，孫中山又召集國民黨代表五十九人開會，審議經過修訂的中國國民黨改進黨案，並推胡漢民為宣言起草員。至十二月十六日，他再次召集各省代表六十五人開會，討論修改已起草的中國國民黨改進黨宣言以及黨綱黨章。正如孫中山稍後在答覆山西國民黨人陸世益的信中所表示

29 《國民黨員不可存心做官發財》、《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百六十、四百七十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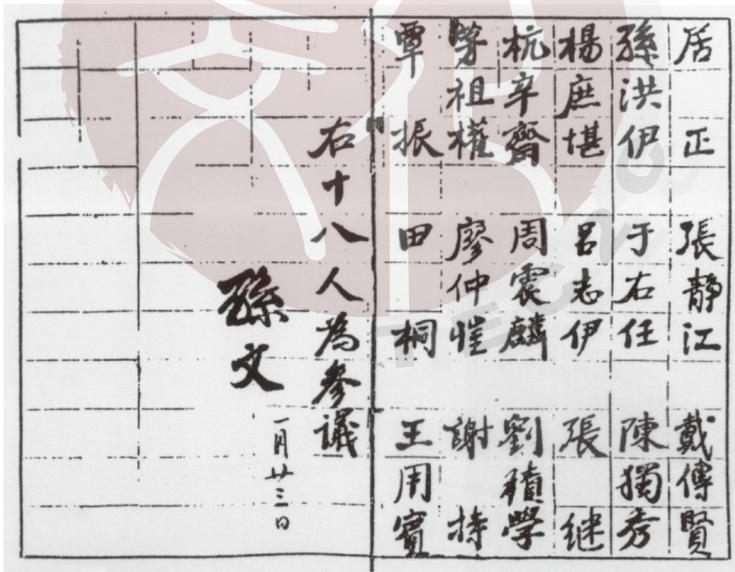
30 王章陵：《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史論（一九二〇—一九二七）》，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一九七三年版，第八十九頁。

的那樣，他是在積極地進行著「改組黨務」的工作³¹。

中國共產黨採取了許多實際步驟說明

孫中山，如派代表參與研究國民黨改組計畫，草擬宣言和黨綱、黨章，並接受孫中山的邀請，派出共產黨人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以增強國民黨的進步力量，同時說明他建立組織，開展工作，從而使這個衰老的政黨由於得到新鮮的革命血液而有了生機。所有這些，說明孫中山確已邁開了前進的步伐，踏上了革命的新征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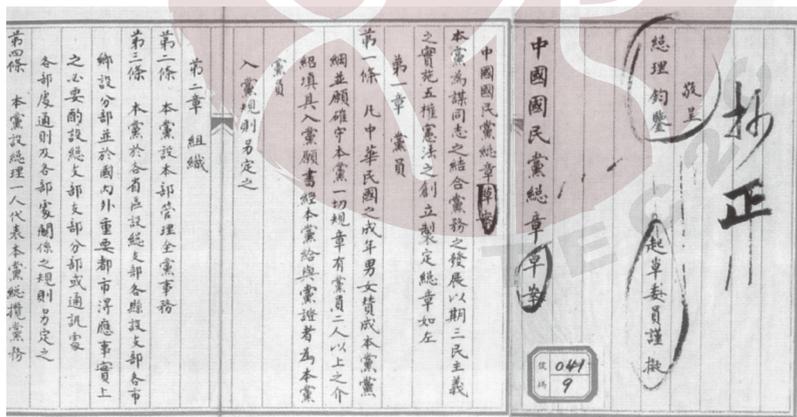
在上述三次改進國民黨會議的基礎上，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孫中山發表了《中國國民黨宣言》。宣言中強調今後革命必須依靠民眾力量，提出：「今日革命則立於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嚮導。」革命事業應



孫中山任命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國民黨參議人員名單。

31 陸世益：《孫中山先生兵工政策論》，上海北新書局一九二九年版，第一百三十五頁。

「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並且「依三民主權之原則」，提出了「國家建設計畫及現所採用之政策」。民族主義方面：由於中國仍然「陷於為列強殖民之地位」，所以，必須「內以促進全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要求「厲行普及教育，增進全民族之文化」；「力圖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地位」。這是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條約的綱領。民權主義方面：鑒於「現代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主義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為少數操縱」，因此，應當「實行普選制度」，使群眾「直接行使創制、複決、選舉、罷免各權」，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權」。民生主義方面：「由國家規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鐵路、礦山、森林、水利及其他大規模之工商業、應歸於全民者，由國家經營管理，並得由工人參與一部分之管理權」。此外，還包括「制訂工人保護法」，「改良農村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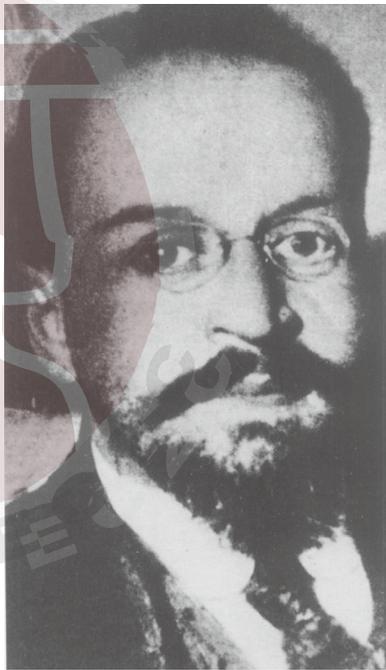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通過了修改後的中國國民黨黨綱，宣佈以「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為建國綱領。圖是經孫中山批改的黨綱草案（部分）。

織，增進農人生活」³²等等。從這裡可以看出，孫中山的思想正由於接受共產黨人對他的影響而發生明顯的變化。

《中國國民黨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國民黨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轉變，成為國民

黨改組的先聲。接著，孫中山又於二日召開中國國民黨改進黨大會，公佈了《中國國民黨黨綱》；三日，公佈了《中國國民黨總章》。同月下旬，他還以總理名義任命了國民黨本部各部部长：總務部正副部長是彭素民、林祖涵（伯渠）；黨務部正副部長是陳樹人、孫鏡；財務部正副部長是林業明、周佩箴；宣傳部正副部長是葉楚傖、茅祖權；交際部正副部長是張秋白、周頌西。又任命廖仲愷、陳獨秀等二十一人為參議。軍事委員會委員、本部幹事、書記及國內總支部、分部成員，也一律重新委任。

與此同時，由於馬林、張繼等人的斡旋，終於促成了孫中山與越飛的直接會晤。這年一



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與蘇聯共產黨代表越飛多次商討兩黨合作問題，最終確定「聯俄」政策。圖為越飛。

月十七日，越飛由北京南下到了上海，翌日即到莫里哀路二十九號和孫中山會見。他們接連舉行多次會談，李大釗、宋慶齡等也參加，進一步商討了中共加入國民黨、改組國民黨與建立軍隊，以及蘇聯³³與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和反對帝國主義等問題。

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越飛在上海簽訂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這是孫中山聯俄政策的重大標記，它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的正式確立。宣言中聲明：「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它以平等互助的精神，規定了中蘇兩國人民間的關係。³⁴這個宣言，體現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關懷和對孫中山的友誼；反映出孫中山丟掉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轉而尋求國際革命勢力援助的願望。

在宣言簽訂後，孫中山又指派廖仲愷到日本和越飛繼續進行細節商談，以便把中俄聯合的問題具體化。廖仲愷同越飛在熱海地方會談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學習俄國革命經驗，改組國民黨和建立革命軍隊等問題，進一步詳細地交換了意見。也正是通過和越飛的相處懇談，使廖仲愷對蘇俄有了進一步瞭解，開始明確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從而使他此後竭誠擁護和全力支持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革命政策。

33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蘇俄改稱蘇聯。

34 《孫越宣言全文與國共聯合》，《外交月報》第二卷第一期。

孫中山先生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聯合宣言

孫逸仙博士與蘇俄派至中國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發表下記宣言。在越飛君留上海時，與孫逸仙博士為數度之談話，關於中俄關係，披瀝其許多意見，對以下各點，尤為注意。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之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熱誠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二、為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運煤列舉之原則。越飛君因此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祇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議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現在中東鐵路之管理，事實上現在祇能維持現況。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祇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以雙方實際之利益與權利適時改組。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正式向孫博士宣稱，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古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抗行為之發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博士以最親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再來中國南部，然後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孫逸仙、越飛簽字。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蘇俄代表越飛聯合發表宣言，宣佈行合作。圖為孫、越《聯合宣言》。

在這期間，孫中山謀劃的另一個重要戰鬥任務，是致力於收復廣東，重建革命根據地。他認為，要使革命成功，「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欲得憑藉，則非恢復廣東不可」，否則，「我不過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輕重」。³⁵所以，孫中山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將駐紮福建的北伐軍改名為討賊軍，任命許崇智為東路討賊軍總司令；又於同年冬季聯絡駐留廣西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和梧州及西江的部分粵軍，組成了西路討賊軍。然後，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四日，發出通電討伐陳炯明，命令討賊軍奮勇殺敵，「為國家

和平統一宣言

北京黎元洪先生張敬堯先生馮煥章先生天津段芝泉先生奉天張雨亭先生保定曹仲理先生洛陽吳子玉先生南京齊耀萬先生杭州盧子嘉先生並各省農工商學各界及各報館轉全國國民公鑒文於往年八月十五日發表宣言對於國事主張使護法問題完全解決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對於粵軍士商討擬回粵粵之陳炯明以申國法而靖粵難者許誠謂法軍已過去陳述而設定粵局則陳炯明既除建設斯易文於推釋將士及綏靖地方外當竭盡心力以政促和平統一之進行並務以求達護法事業之圓滿結束如是庶幾六年以來之血戰得歸於專制民國於法治之途凡諸國權性者可得代價而少慰而此分崩離析之局亦不得歸於絕一文始獲與國人審察討論以圖治權惟願全國以北京政府尚未純合法之事實故獨多獨立自省分北京命令不能遵及統一之業仍屬無期迴憶年來南北紛爭兵災迭見市廛廢墟四圍為墟盜匪乘隙橫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苦之情狀揆目觸心文雖為國權性之途苟非變出非常萬不獲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窮者四顧悲憫時因護法之故不得已而用兵至於今日則各方派有借借使往來力求說解之昔時已為進步護法者所不為時局一大轉捩誠得西南護法諸君監護巨助以底於成此進之中國當已入於法治之軌徒以陳述復變護法政府中斷而北京政府所為遂致任情而未有尊重法律之能事託於恢復法統國會糾紛及今未解而於人民所渴望之裁兵監督諸大端反言行相違不復稍顧其求而增兵備戰之意且靡上不知兵日益增政日益弊長此不悛匪特求治無期助亂速禍實未知所止今之大病固在執政稱兵者未有尊重法律之誠心而國中實力諸派利害不同莫相調劑亦其政此之緣故試舉今日國內勢力彼此不相攝屬者率統計之可別為四一曰直系二曰奉系三曰皖系四曰西南護法諸君此四派之實際利害果以何術突亦自難言然彼四派互相提攜互相了解開誠布公使率隨一致而皆以守法奉公引為天職則統一之實不難立見今為數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期以四派相周旋以調節其利害在統一未成以前四派暫時畫疆自守各不相侵內部之事各不干涉先守和平之約以食統一之成俟眾各派領袖誠解所言當暫縮其力所能及及必使和平統一之期於實現而和平之要首在裁兵未有張皇武力進行招募而可訟言和平以強人者誠知兵多之足以亂國禍民則誠之推恐不速不容藉端推讓以類武之私衷為強國之符號各派首領不之明達見勇為當仁不讓其間當大有人在也當此際說有謂後統一後始可議及裁兵者此未免為怯懦之談何者兵不裁則無和平無和平則無統一蓋擁兵以言政而政策操兵以言法而法強權則公理喪武力張則文治弛此必至之一期國民人所身受而誰能詳釋者也不裁兵而和平猶狹狹以讓讓不和平而官統一猶與爭為求友好惡者且其然嘆之而况並世之賢豪豈復味此而兩國人可以欺耶然此非徒責難之說而空之論其裁兵辦法可以言之者文錦之已審其綱要有三一本化兵為工之旨先裁全國現有長官之半二各派首領裁成後全數簽名收請一友軍為佐理籌畫裁兵方法及經費三裁兵借款其用途除法定監督機關外另有債權人並全國農工商學各團體各舉一人監督之其詳細條目則由專員妥訂請公報備閱今可謂諸君行此在諸公一轉念間而國民將成拜嘉焉文亦當西南護法諸君從從之後不敢有遺統一成而後一切與軍乃有可言財政教育諸端始獲次第籌理國民意志方與以自由發舒而不為強方所蔽障其為統一一則水久而非一時精神而非形式國人同奮於法律範圍之內而無特殊勢力可以防國而非和以假以竊權之具也如是乃真民治重符共和盛軌以與列強共濟於平等之域百世實利賴之不然而其能敢不自敗自焚文愛國若命將不忍坐視論者謂公之明當不復令不復令至此語曰公之好護法不如我護法當代人實謀國有素其一帶語而決於許之毅然行之乎此實誠誠之忠言明代人呼而黨議公相與實踐以堪慮與委統之失而寒河清鏡錢之機也敬布區區願聞教孫文民國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發於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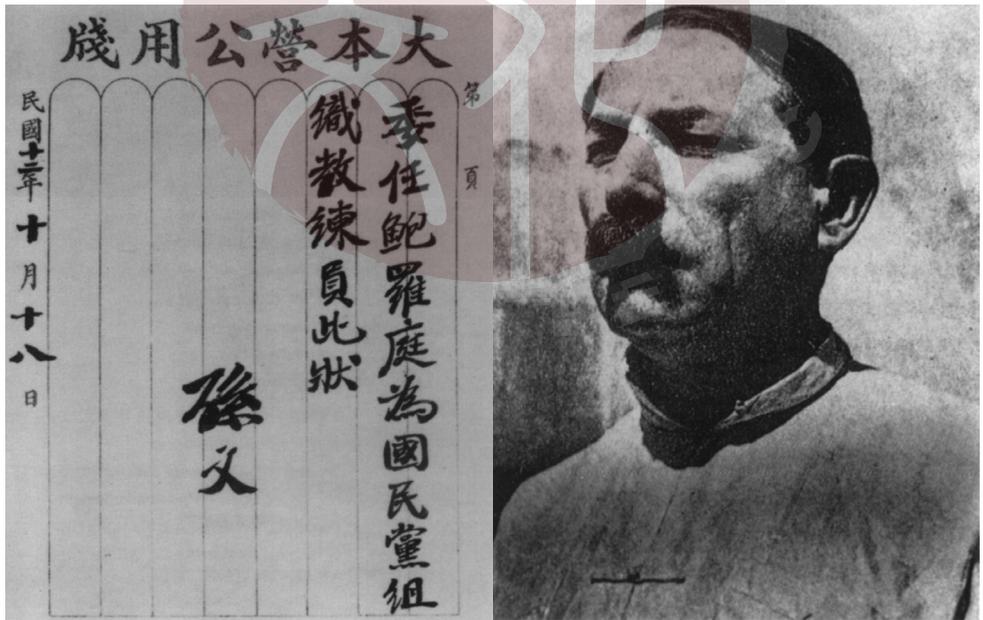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發表《和平統一宣言》，主張「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反對北方軍閥提出的「武力統一」主張。圖為《和平統一宣言》。



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策動粵軍和滇桂軍隊將陳炯明逐出廣州。二月十五日，孫中山由上海轉往廣州途經香港。圖為二月二十日孫中山參觀香港大學及向師生演講後與師生合影。



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陸海軍大元帥職時檢閱軍隊的情景。孫中山背後左起：程潛、林森、伍朝樞、孫科、廖仲愷。



孫中山任命鮑羅庭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的委任狀。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八日，孫中山委任蘇聯代表鮑羅庭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圖為鮑羅庭。

除叛逆，為廣東去兇殘」。³⁶西路討賊軍隨即出師梧州沿西江東下，發動了對陳炯明的進攻。由於粵軍第一、三師等的起義回應，陳家軍土崩瓦解，迅速潰敗。一月十六日，陳炯明被逐出廣州，退往惠州。

二月二十一日，孫中山由上海又返回廣州，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為了爭取與北方的和平統一，孫中山決定不復任總統，以避各方面的猜忌，當即重新成立了大元帥府，就陸海軍大元帥職，並委以廖仲愷、伍朝樞和譚延闓開分任財政、外交、內務三部部長。

廣州革命政權重建之後，孫中山繼續積極進行改組國民黨的準備工作。他在四月一日指令正式恢復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八月十六日應蘇聯的邀請派出了蔣介石、沈定一、王登雲和共產黨人張太雷四人組成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軍事、政治和黨務以及洽談蘇聯援助問題；還邀請蘇聯的政治和軍事顧問來廣州，幫助他進行革命工作。十月六日，蘇聯政府應邀派出的駐廣州常設代表鮑羅廷³⁷到達廣州，被孫中山聘請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具體指導和幫助國民黨改組。孫中山毅然採取這一行動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工作大大加快了進度。

36 上海《民國日報》，一九二三年一月五日。

37 鮑羅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年），俄國威特比斯克省人，一九〇三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黨，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從事黨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月應孫中山的邀請到達廣州，先後被聘為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高等顧問和革命委員會顧問等職。在一九二七年七月汪精衛叛變革命以前，他一直擔任國民黨的顧問工作。他在幫助國民黨改組和創辦黃埔軍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孫中山這些勇敢的步伐，使他晚期的政治生命放出了光輝的異彩。

早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共產國際已通過了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五月，馬林帶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加強同國民黨的合作。³⁸六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專門討論了關於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孫中山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

在討論中，曾出現了兩種錯誤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民主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領導，「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這實質上是看不清共產黨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責任。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關門主義，則否認無產階級需要有同盟軍，反對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特別是反對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這實質上是不懂得無產階級幫助同盟軍的重要性。大會經過激烈爭論，批判了「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的民主主義立場和把國民黨改造成為革命聯



陸海軍大元帥印印文。

38 道夫·賓：《斯內扶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產黨》，載《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四十五頁。

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為了聯合革命力量，會議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正式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同國民黨合作的訓令，確立了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決議指出：「我們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的需要。」；「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個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其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

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為幫助國民黨改組，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三號通告》，要求全體黨員積極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並具體部署各地黨組織保證改組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真誠有力的幫助下，孫中山很快完成了國民黨改組的一切準備工作。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九日，他委派廖仲愷、李大釗、汪精衛、張繼、戴季陶五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負責籌備改組事宜。二十四日，又委託廖仲愷和鄧澤如召開國民黨特別會議，商議改組問題；孫中山特派廖仲愷、胡漢民、林森、鄧澤如、楊庶堪、陳樹人、譚平山、孫科、吳鐵城九人為臨時執行委員，李大釗、汪精衛、謝英伯、古應芬、許崇清五人為候補執行委員（同年十一月八日，又加派林雲陔、馮自由、徐蘇中、林直勉、謝良牧五人為候補執行委員），組成新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籌備改組工作的中央機關。

同月二十五日，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在廣州財政廳舉行，討論改組的必要性和計畫。參加者約一百餘人，由廖仲愷主持。與會者經過認真討論後，一致贊同按照所擬定的計畫進行改組，並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這次會議是國民黨改組的起點。

三天之後，即二十八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成立。它自十一月一日起，為加快改組的進程，連續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改組中的若干具體問題，並著手起草宣言、黨綱、章程草案。十一月十二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宣言中提出：「竊以中國今日政治不修，經濟破產，瓦解土崩之勢已兆，貧困剝削之病已深。欲起沉疴，必賴乎有主義、有組織、有訓練之政治團體，本其歷史的使命，依民眾之熱望，為之指導奮鬥，而達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否則民眾蠕蠕，不知所向，惟有陷為軍閥之牛馬、外國經濟的帝國主義之犧牲而已。國中政黨，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凡此派流，不足齒數。而吾黨本其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曆有年所，中間雖迭更稱號，然宗旨主義未嘗或離；顧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則以組織未備、訓練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運用不靈，雖有大軍，無以取勝。吾黨有見於此，本其自知之明，自決之勇，發為改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先由總理委任九人，組織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始其事；行將召集海內外全黨代表會議，以資討論。關於黨綱章程之草定，務求主義詳明，政策切實，而符民眾所渴望。而於組織訓練之點，則務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惡留良。吾黨奮鬥之成功，

將系乎此，願與同志共勉之！」³⁹

改組宣言發表後，迅速進行改組事宜。在廣州開始黨員重新登記。整頓了市黨部、區黨部、區分部的組織；調查農民、工人，以及城市各階層人民的狀況；合併大本營黨務處、大本營直轄委員會、廣東宣傳局，統一於臨時執行委員會，加強宣傳機構，大力開展改組前的宣傳工作。為此，對外聯絡全國同情革命的報社，擴大宣傳；對內嚴格限制黨員任意對外發表有關黨務的言論和意見。為了對黨員幹部從嚴訓練，設立講習所，以培訓各區分部的執行委員。還制定召開代表大會議事綱要，推舉了說明人；指導大會代表的選舉；分別召開黨務會議和黨員大會，討論籌備改組的有關事宜等等。

同時，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還決定翌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並決定每省代表名額為六人（各省黨員推舉三人，孫中山指派三人），海外總支部、支部代表約十二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正常情況下，每週開會兩次。當時由於盤踞在東江、潮梅一帶的陳炯明叛軍不斷向廣州進攻，孫中山把大元帥大本營移駐東江前線，以便親身督戰，但他有時仍趕回廣州主持會議；而經常主持會議的，是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廖仲愷。該會自成立之日起，至國民黨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止，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共開會二十八次，議決各種案件四百餘件，為國民黨改組做了大量的工作。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同時公佈了《中國國民黨綱草案》和《中國國民黨章程草案》。

稍後，李大釗也應邀由北京到達廣州，積極幫助孫中山完成改組國民黨和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準備事項。

十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還委派廖仲愷、胡漢民赴上海與各省支部商討改組問題，並傳達國民黨改組的意義及措施，統一大家的認識。他們到上海後，立即召開中央幹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謝持、張繼、呂志伊、居正、丁惟汾、戴傳賢（即戴季陶）等十五人，由廖仲愷說明改組的原因在於「黨的主張無力」，「本黨自同盟會以來，即無精密組織」，「改造中國之責即在吾黨，倘非從下層多做工夫，而徒拘泥於上層之幹部，必不足以負此偉大責任」。之後，成立了上海臨時執行委員會，負責上海的改組工作。

在十二月間，孫中山曾連續對國民黨員作了三次講演，表示他改組國民黨和學習蘇聯的決心。他認為：「蓋以兵力戰勝而成功是不足靠的，以黨員力量奮鬥而成功是足靠的。質而言之，靠兵力不得謂之成功，靠黨員方是成功。即以兵力打勝仗非真成功，以黨員打勝仗方是真成功。」⁴⁰並指出：「吾黨欲求真正的成功，從今以後不單獨專靠軍隊，要吾黨同志各盡能力，努力奮鬥。而且今後吾黨同志的奮鬥，不要仍守著舊日人自為戰的奮鬥，要努力有組織、

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⁴¹還說：「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和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⁴²並明確指出：「吾黨之改組，乃以蘇俄為模範。」⁴³

經過了不斷的挫折和失敗，吸取了無數的經驗和教訓，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工農群眾運動的推動下，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忠實於革命民主主義的孫中山終於找到了朋友，找到了真理，找到了革命的唯一出路。



4 1 《孫文選集》下冊，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第三百二十頁。

4 2 《人民心力為革命成功基礎》、《孫中山先生最近講演集》，廣州一九二四年版；《孫中山選集》下卷，第四百八十一頁。

4 3 《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百八十四頁。